

美资企业撤离珠三角

地价、人力成本飙升令中国成本优势削弱 本土中小企业或可补位美企市场空间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2008年3月,《华尔街日报》曾“预言”：“珠三角有上万家外资企业倒闭或外迁。”这条消息曾引发国际国内极大关注。时过境迁,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经历欧债危机的外资企业在华命运几何?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就在该报告发布的前几天,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

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不少高附加值产业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线已经或者正在迁回美国。这是回流大潮来临的征兆还是假象?中国应以怎样的心态看待美资企业撤离中国?同行业内的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王利博制图

MADE IN CHINA 变身 MADE IN AMERICA

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监测数据,今年前8个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67家,同比下降5.2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5.45亿美元,同比下降14.42%。

一个接着一个。是“蓄谋已久”还是巧合?

《羊城晚报》调查发现,从今年3月起,美国人在商场购买碳纤维棒球棒和烟雾报警器时,他们会发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产地标签已被悄然换成MADE IN AMERICA(美国制造),而美国音响发烧友拿起“SleekAudio”耳机时,他们也会发现,同样的价格,他们买到的是“美国制造”而不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

这些产品过去都是在广东东莞生产的,现在生产线都迁回美国本土了。美国耳机生产商SleekAudio近期

将生产业务迁回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一消息很快引起美国媒体和咨询公司的关注。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这是美国制造业回流风潮的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玩具生产商Wham-O决定将50%的飞盘和呼啦圈订单在美国国内生产,这些订单此前一直是交给中国等地的工厂;美国发光二极管灯泡生产商SeesmartLED公司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如今却正筹备将其整个海外业务迁回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与美国汽车工人协会达成协议,福特公司宣布将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此前这些

业务通常外包给中国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NCR已经把部分ATM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

世界500强企业卡特·彼勒公司的美国主页也显示,卡特·彼勒已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南部的维多利亚市开设新工厂。该项目将在2012年正式投产,生产液挖掘机,一旦全面启动,将会使美国本土产能提高三倍多,并为本土员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沈伟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有一些美资企业撤离珠三角,但是说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现象也有些言过其实。

沈伟判断,只是一些美国企业发生转移,欧盟和美国对华投资总体上仍然强劲。“当然,由于撤资的时间不同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际的韩资企业撤离,而且撤资的企业中有些是业界的翘楚,因此会有些吸引眼球的效果。”沈伟表示。

然而,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监测数据,今年前8个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67家,同比下降5.2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5.45亿美元,同比下降14.42%。

中美两地生产成本已逐渐接近

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中国沿海城市略高5%—10%,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大大超过中国。

虽然目前缺少整体性的资料和信息实证的判断,沈伟仍然认为,部分企业撤资可能与企业投资期限届满、公司集团内部重组、市场占领布局等众多因素有关。

薛胜文认为,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由于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受到抑制,美国的制造业不振造成美国政策导向作用增加,技术性产业回迁力度加大。

一般看来,包括制造业在内产业的重新布局和调整是常态。但此次出现的部分美资企业撤离与金融危机开始时发生的制造业转移的成因不同,可能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恰逢国内《劳动合同法》出台,守法成本可能对一些外资的成本运营产生叠加效应,一部分外资经历了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订单减少和内部运营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

此外,人民币的升值也给外向型企业造成很大压力,这个压力还在发生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在中国的获利空间不

断收窄,从长远看,这些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可能甚至是必然的。

“这次撤资引人之处还在于部分撤资的美资企业是重新转移到美国,而不是劳动力或原料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沈伟分析。

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一些撤资的企业是制造业里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这些企业要求的制造业水平本身比较高,所以需要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工人,这可能只有在比较少的国家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由于附加值比较高,产品价格也比较高,因此,能够销售这些产品的市场也处于高端市场,这样美国本土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就很自然。

第三,这次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有了新的启发和教训。光是发展金融服务业,经济空心化,因此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是发达国家下一个阶段振兴经济的方向。

探究美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深层原因,还需要梳理美国国内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情况。

在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和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自2007年开始就退出“投资美国”计划,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到美国投资。目的是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创造繁荣。

为了推行这一计划,美国政府努力减少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障碍,简化政府审批外资繁琐的公务程序,解决外国投资者关切的各种问题,如医疗保险、能源成本及美国签证政策等;为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帮助,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项目吸引海外投资,促进在全国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发展。

此外,传统意义上产业转移的原因,包括人力和原料成本,市场占有率、交易成本等仍然或多或少地产生着作用。

据调查,中国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甚至已经高过美国。中国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0.22美元。其中,中国宁波、南京、上海、深圳四个城市每平方米工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而美国阿尔巴马州工

业用地每平方米的价格却只有1.86和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的价格则在1.3—4.65美元。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企业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的人员/生产成本有一定幅度的提高,美资个别技术型企业衡量在美生产效率和次品率后,部分企业选择将产业回迁以提高生产效率。

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希尔金指出,200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则上升到31%。2010年,中国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8.62美元,美国南部是21.21美元;到2015年,预计长三角中国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将上升到15.03美元,而美国南部则是24.81美元。

希尔金总结说:“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中国沿海城市略高5%—10%,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大大超过中国。

思考

以平常心 看美企撤离

■ 张沛源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称,随着中国正快速涨薪“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同时,因为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因此某些商品在美国制造可能更为经济,而由此美国企业回迁的“临界点”已开始显现。在该报告宣布前几天,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

在一些人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曾经被看做是最具投资潜力、最具成本优势的中国,现在突然失去了魅力,总让人有些沮丧。原因很简单,外企的撤离,意味着资金的流失,意味着工作机会的减少,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减弱。对于主要靠着投资发展的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要承认的是,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对外资的撤离也不需要大过于杞人忧天。第一,外资企业的撤离是个别行业,眼下,尽管中国劳动力价格正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上升,但依然具有足够竞争力和吸引力,特别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也包括美国自身而言。

况且,对于企业而言,一味追逐劳动力投入上带来的优势,并不是长远的发展之计。对于企业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利润。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是劳动效率过低。

其次,对于美国企业的回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的不得已的回应。近日,由失业引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美国卷起一阵游行龙卷风。说明的问题是,不论是对于白宫而言,或者是对于金融大鳄而言,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不可小觑。

为避免国内动荡进一步恶化,政治上需要让步与民众,企业大亨同样也需要考虑本土的稳定。回迁,既是对白宫的“友好回应”,又是对人民群众的正面交代,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所以说,回迁既有企业运营的考虑,但更多的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

此外,笔者认为,外企的回迁对中国来说,并非全然没有好处。从积极的一面去观察、去分析、去考量这个变化,是会得出很多好的结论来的。比方说,回迁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也值钱了。还比方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有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等。

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让一些跨国企业感到中国的优势正在丧失——这是在经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国,不可能只是制造大国,永远处在最低端;中国人,也不可能永远是“廉价”的代名词。中国要经历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的过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必然的,当然,也必将伴随着的是劳动力价格的提高。

美企秉承的撤资策略是基于一个构想,就是产业在未到衰退之前,企业尽早将其事业卖掉,可以使其净投资回收率最大。当企业在产业残留的小区需商上只有很少的优势,而且当衰退产业中的竞争会很激烈时,这个策略是相当恰当的。最佳的选择也许是将公司出售给产业中追求领导策略的企业。

迅速破产也能迫使企业面临一些退出壁垒,虽然及早行动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些因素的作用。但企业可以采用私有商标的战略或将生产线出售给竞争对手的方式来帮助缓解这些问题。迅速撤资策略很明显是企业避免损失的最快方法之一,而实施迅速撤资策略的主要方法就是资产剥离、分立等公司紧缩的方法。从这一点来看,公司紧缩是企业迅速撤资策略的必经之路。

其实,不仅仅是外企,对于中国本土的企业而言也面临着一个高成本、低利润的时代。最近,温州一些中小企业亏损、倒闭,其中资金链条断裂是罪魁祸首,但是与成本快速上升恐怕也不无关系。但是,恐慌和逃避都不是办法,危机之中其实也有机遇存在。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企业一次绝佳的转型机遇。

不过,话说回来,外国企业的撤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告。怎样打破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瓶颈?怎样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怎样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怎样让中国本土企业能健康发展,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值得决策者深思,全力应对。

相关

珠三角民间借贷 达数百亿元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后,有人将其称为中国民间借贷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仍将有第二张、第三张牌倒下?如今这一预期正在转变为现实,珠三角正在成为继温州之后,民间借贷市场危机的新焦点。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珠三角的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数百亿元,在企业经营出现困境之下,珠三角也正在上演着温州式的老板跑路潮。珠三角的企业老板受访称,由于出口形势不断严峻,今年珠三角中小企业亏损幅度加大,加之借贷利率水涨船高,还款的压力明显高于往年。

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与否,需要看房地产与制造业的“脸色”。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加码,开发商资金链压力加剧,房地产市场陷入“寒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温州与珠三角均是出口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对于这些出口企业而言,外有需要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内有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珠三角等出口企业寒冬将更为漫长。这也是导致民间借贷危机接连发生的主要原因。

与温州有所不同,珠三角的金融机构更多,更发达,融资渠道也相对较多。从这一点看,珠三角民间借贷崩盘的可能性要小于温州,与此同时与温州松散的民间借贷相比,珠三角的民间借贷主体是民间担保机构,出了问题之后影响的范围也将小于温州。

但这些乐观因素并不能解决珠三角的民间借贷危机。据调查显示,目前珠三角年利率普遍在本金的50%以上,高额的借贷成本最终导致了民间借贷的结局。多年以来,民间借贷一直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对此市场也有声音呼吁,让民间借贷阳光化是解决民间借贷危机的有效方法。如何使得民间借贷由灰色走向阳光是一个慎之又慎的问题,处理的好将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之将会加剧借贷的风险。

美资撤离是否具有带动意义?

美资撤离珠三角对中国制造业影响并不大:一方面,美资在华投资总量占比并不高;另一方面,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客观的促进作用。

面对美资撤离,有媒体发出震惊的声音。对此,沈伟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对中国同行而言,这可能是一次机会。”

沈伟认为,因为这些制造业企业外移为本国企业打开了空间。中国制造业可以顺势而上,占有更大的国内市场。

沈伟分析,这些转移的企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会在中国。

产业外移的最直接影响是就业市场和劳动力需求会发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次部分企业转移到美国本土说明制造业中的人力成本不再是我们的优势,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就要从法律环境等守法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做文章。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

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可能加快,中国企业的内涵建设也应该提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不是引入外国品牌,而是创造中国品牌、增加产品和制造技术中的知识产权含量。”沈伟说。

“另外,美资撤离相对资金需求会减弱,比如银行贷款,之前肯定会优先贷给外资企业,随着美资企业的撤离,资金需求减弱的话,资金流向必然倾向本国的中小企业。”

沈伟同时指出,美国、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在布局、趋势走向方面有所不同;美资撤离珠三角暂时未形成气候,仅仅是个别的高端制造企业,所以还很难波及当地的韩资、日资企业。但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给韩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带来了影响。

那么,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美资企业撤离中国?同行业内的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

答案是,无论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国制造业企业都应当以平常心看待外资转移和撤离。

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这样的产业转移和撤离还会继续。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产业转移是常态的经济现象,这在二战以后的多次产业转移中可见一斑。

即使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重镇底特律就是在产业转移中完全空心化,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产业升级是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应对之策。以吸引外资为己任的地方政府应当更加切实地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法

制的软环境。外资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可能还是执法的不确定性,这就有了外国投资者中有名的“守法成本”或“政府成本”。沈伟指出,地方政府应当切实在外资保护方面推行依法守法,降低此类交易成本。

薛胜文也认为,美资撤离珠三角实际上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大,一方面,美资在华投资总量占比并不高;从珠三角地区投资格局来看,港澳台投资占比较大,美资虽然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客观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人才供给和市场空缺(美资企业的中国市场)两个领域,这将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导向阶段表现更加积极。